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共和国日记

1956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共和国日记. 1956 /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编.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215 - 10781 - 6

I. ①共… II. ①共… III. ①中国历史 - 现代史 - 史料 IV.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5547 号

出版统筹 陈智英
责任编辑 张剑英
责任校对 周 利
封面设计 杨 振

出版发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36)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45.75
字 数 11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0 元

共和国日记

195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当代中国研究所
联合编撰

执行主编	武国友	
副主编	邢和明	
参加编写人员	邢和明	王世勇
	徐 锋	谢为红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成员

编委会主席	陈奎元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编委会主任	冷 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欧阳淞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曲青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李从军	新华通讯社原社长			
	李 捷	求是杂志社社长			
编委会执行主任	林炎志	吉林省委原副书记			
编委会执行副主任	朱立波	中共中央办公厅			
	张树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张国良	香港文汇报社原社长			
执 行 编 委	武国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主任			
	刘金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原主任			
	齐 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副主任			
	陈东林	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刘国新	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正华	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俊霄	孔祥文	田胜立	曲青山	朱立波
	刘国新	刘金田	刘晓明	刘 敏	齐 彪
	李从军	李正华	李国君	李家强	李 捷
	李 勤	何卓新	冷 溶	汪季贤	张国良
	张树军	张 鹏	张黎明	陈东林	陈奎元
	陈智英	邵 祥	武国友	林炎志	欧阳淞
	周五一	班岳云	蔡国江	樊如钧	
总 策 划	邵 祥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秘书处工作人员

秘 书 长	邵 祥		
常 务 副 秘 书 长	田胜立		
副 秘 书 长	刘冬波	汪季贤	武清月
(按姓氏笔画排序)	班岳云	樊如钧	
副 总 策 划	田胜立	刘冬波	班岳云 蔡国江
办 公 室 主 任	刘冬波 (兼)		
副 主 任	班允财		
工 作 人 员	陈 云	于 洁	张丽君
编 辑 部 主 任	田胜立 (兼)		樊如钧 (兼)
副 主 任	王 涛	邵 晨	
主 任 助 理	李天巍		
编 辑	赵 宁	浦凯迪	马 虹 李柏瑾 刘 媛
宣 传 部 主 任	樊如钧 (兼)		
副 主 任	付 琰	李 富	杨成军
外 联 部 主 任	班岳云 (兼)		
副 主 任	朱清振	毕德才	欧阳武
工 作 人 员	郑松培	查怀白	罗兆银
出 版 部 主 任	田胜立 (兼)		
副 主 任	邹朝晖		
发 行 部 主 任	汪季贤 (兼)		
副 主 任	谭卫芳	班钦东	周 冉
影 视 部 主 任	武清月 (兼)		
事业发展部主任	张瑞龙		
副 主 任	班耀福	孙树涛	
法 律 顾 问	刘红宇	李月峰	

序 言

余 平

十八大前夕，几位同志来，说他们正在编辑《共和国日记》，一年一本，“十一五”期间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经过五年的工作，即将出版，要我写个序言。

翻阅日记1949年卷清样本，按月、周、日依序写来，仿佛又回到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子。当时我30岁出头，在东北做工会工作。民族危亡中投奔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根据地和国统区，亲见先烈牺牲和身边战友倒下，他们毕生奋斗和为之献身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党的旗帜插遍祖国大地，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随着共和国的诞生来到。当时我在沈阳，在广播里收听北京的庆典，和同志们一起欢呼跳跃。记得当时沈阳举行庆祝建国^①的大会，十几万人涌上街头，全城淹没在红旗的海洋里。我在波涛汹涌的游行队伍中，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唯一的愿望，就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加奋发地工作。

从那时起，60多年过去了，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每天都有新事物、新创造，真正是日新月异。

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正式出版。这是一部中央审定、无论资料或论述都具权威性的国史稿。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共和国日记》，可以和这部国史稿相映成趣，使国史的庞大架构更加血肉丰满。一个人可以有日记，现在是共和国的日记。为国家记日记，是一种史学创新。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

^① 指新中国成立。

重现亲历者当时的见闻和感受，特别是引入社会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活动，避免过多会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累积造成的沉闷，揽国家民族之命运，察社会百姓之生态，历史就活了、生动了。

中华民族有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博大胸怀和进行新的创造的恢宏气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但是中国岿然不动，站住了、发展了，靠什么？归根结底，靠社会主义，靠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小平同志讲，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世界各国的经验很多，需要分析、消化、结合中国的实践，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经验。即便是自己失败、曲折的教训，科学总结，引为借鉴，也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现在编写《共和国日记》有好条件。有党的历史决议和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指导，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可以参酌，又出版了不少回忆录。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把握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主线，伴随国家发展的脚步，一部一部编下去，一定会取得越来越丰富的经验。

祝贺《共和国日记》出版，愿它作为我们伟大国家的信史，发挥认识过去和创造未来的作用。

2012年12月5日

前言

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而载入史册。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于1956年。为了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两篇序言，104篇按语。毛泽东说，中国革命胜利并未使他有多大的高兴，而真正让他高兴的是中国几亿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到1956年3月，全国加入合作社农户的比例达到90%。同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按照3月份的数字发布新闻，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

不仅中国农民向往社会主义，就连一些资本家也是如此。他们相信，到了社会主义，大家都有一份工作，人人都“有饭吃”。有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希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还有位著名的工商业家表示，他们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1956年1月，北京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市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第一个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北京市为全国树立了榜样，全国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全国范围内随即掀起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1月9日，天津市继私营商业全部过渡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之后，全市50个行业的私营工业5000多个工厂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13日，西安市102个行业的私营工商业5900多户厂店全部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15日，沈阳市105个行业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第二天，重庆市完成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接着，武汉、广州也实现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20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实现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他城市，如南京、成都、保定、鞍山等，也先后完成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一时间，各大城市都沉浸在无比的欢腾之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欢天喜地，锣鼓声、鞭炮声日夜不断。

毫不夸张地说，1956年算得上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的年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犹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这个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八大以后，党在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各个领域继续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果，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他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这个报告确定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前后，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新形势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和“双百”方针。

刚刚进入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刘少奇宣布大会开幕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结论，这就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广大知识分子领略到了春天的明媚阳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把1956年的春天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他称赞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需要这个。毫无疑问，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预示着知识分子春天的到来。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55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中共八大，他们在祝词中对八大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68位代表作大会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共八大的召开，使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无比兴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向大会赠送了象牙雕刻的工艺品，刻画的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情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致词中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5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在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轰轰烈烈的一年。在国际上，则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

这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触及到了当时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难以回避的矛盾。不久，报告的有关内容被西方披露出来，引起国际社会极大震动，也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对赫鲁晓夫的举动，毛泽东说，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好心办了错事。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章对斯大林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给予积极评价，对斯大林后期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毛泽东在会见米高扬时指出，中苏之间对斯大林有些不同的看法，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估价。

6月，波兰事件发生。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局势。毛泽东警告赫鲁晓夫不要干涉波兰内政，并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主义错误提出批评。10月23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波兰局势。10月下旬，匈牙利事件发生。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希望苏联能够出兵支持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

波匈事件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11月2日、4日，毛泽东分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我们4月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

11月11日，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发表著名的普拉演讲，说斯大林错误的产生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和官僚主义组织机构。为此，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分析铁托的演讲和一些国家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

结。文章说：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几乎就在同时，中东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7月26日，埃及总统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法令。一贯主张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国人民，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8月15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声明》说：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是埃及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不论从法律上或道义上来说，埃及的这一行动都是完全正当的。中国政府 and 人民完全支持埃及政府维护自己主权和独立的正义行动。9月17日，中国政府答复埃及政府1956年9月10日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照会，中国政府照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日益广泛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国家，一贯赞同在不损害埃及的主权和尊严的情况下，召开由使用运河的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来寻求和平解决关于苏伊士运河通航自由问题的合理途径。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英、法、美三国强行接管苏伊士运河的战争计划，坚决支持埃及政府坚持和平协商的立场。9月20日，正在举行的中共八大特意休会半天，紧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苏伊士运河的专题报告。11月，中国人民支援埃及人民的斗争进入高潮。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埃及、反对英法武装干涉的通知》，要求各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以及其他经省委考虑认为适当的较大城市，在最近举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大会，支持埃及反侵略的正义立场。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的声明》，强烈谴责英、法两国政府的侵略行为，表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11月3日，中国政府发布向英、法两国政府的抗议书，要求英、法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一切武装进攻，立即撤出它们侵入埃及的一切武装力量，保证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问题必须经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11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的声明》，再次要求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军队撤出埃及领土，真正实现举世渴望的停火。7月30日、8月10日、11日、14日、17日、25日，9月2日、21日，11月1日、3日、5日、7日、8日、9日、13日、17日，《人民日报》就埃及问题多次发表社论。

从8月起，中国人民从道义上对埃及给予极大的支持。一时间，信件、电报如雪片般地飞向埃及大使馆，很多人用诗歌表达自己对埃及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郭沫若要求中国作家，勇敢地拿起笔杆子，“投入尼罗河畔的火热斗争”。他甚至表示，要当一名志愿兵去埃及战斗。无数工人、农民、学生、医务人员报名，自愿到埃及去工作，还有一位

拖拉机手表示要去埃及驾驶坦克。还有，上百万中国人走上街头，声援埃及人民的斗争。他们当中，有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十来岁的小学生，心中都装着埃及人民。

总而言之，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社会来说，1956年都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本卷以大量的史实材料，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多事之秋。

凡 例

1. 本书是一部全方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大型权威性历史文献工具书，用逐日记录的方式，全面准确地从各方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既包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包括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本书以编年体为主，适当结合纪事本末体。事件发生时间不明确的，或与公开披露时间不一致的，以新闻报道时间设条。

2. 正文条目化，既可参照目录通读了解某时段共和国国史，也可利用索引查检大事（按类别分组、组内按时序排列）、要人（按姓氏笔画规范排序）、发生地（按首字笔画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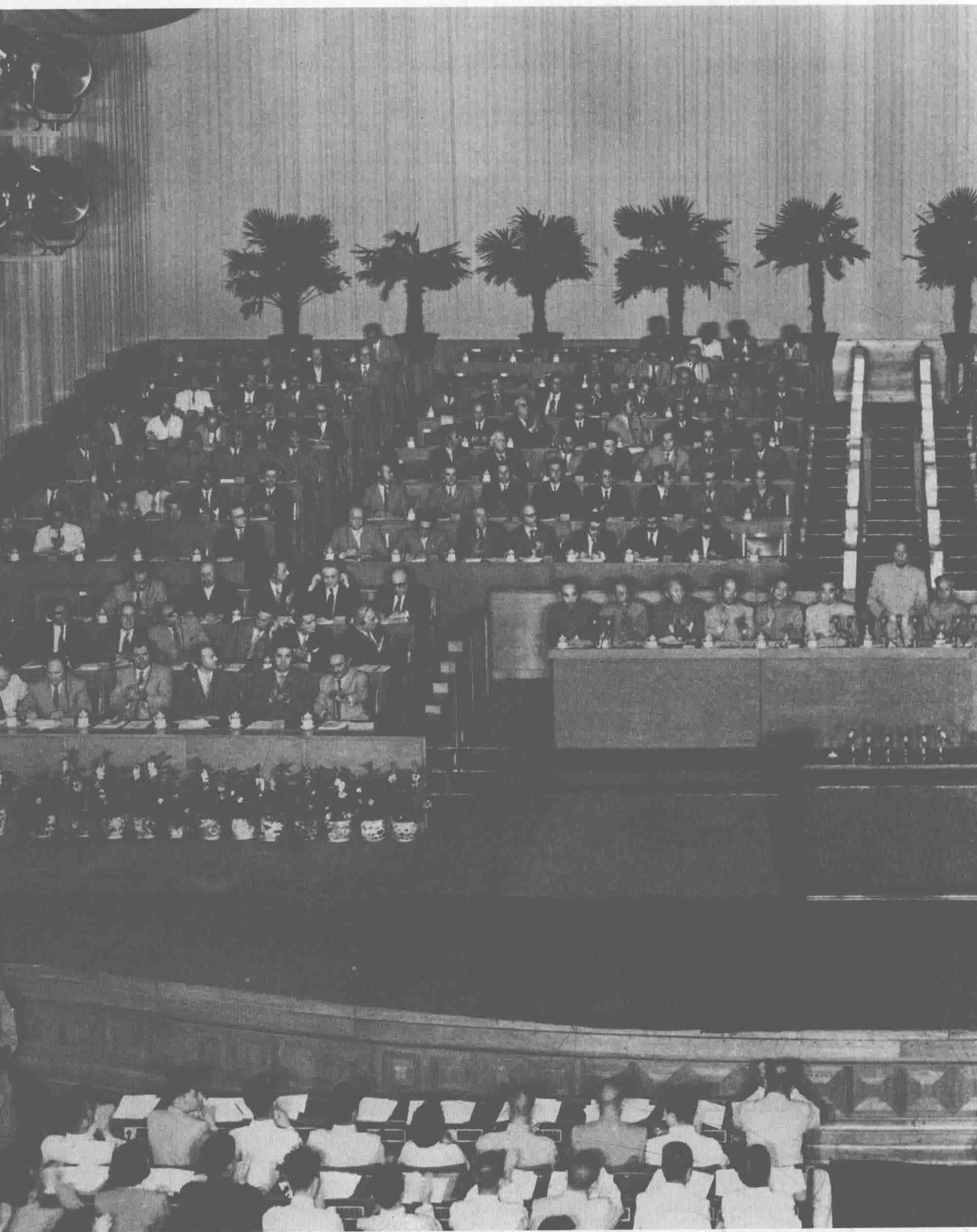
3. 本书每年一卷，自1949年卷开始。每卷内以日为单位安排条目，记述当天发生的大事，按政治（含外交、军事和政法）、经济、教科文卫体、社会、其他顺序排列。页眉（同目录呼应）选辑每日一条要事以便读者查检。每卷条目近5000条。

4. 内文分正文和附录。正文由条目正文和日记链接两部分组成（个别日期没有“日记链接”），日记链接部分的文字加网以示区别，该部分收入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日记、回忆、传记相关内容、有关新闻报道等资料。日记链接的出处在文尾注明。

5. 全书注释采用页下注。人物第一次出现时以页下注标明其时任职务。对旧地名旧校名等也以页下注作出注释。

6. 摘引当时的新闻或文件均保留当时当地的习惯说法，包括计量单位和数字用法，以维持历史原貌。

7. 本书所选条目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历史著作作为基本依据，注重吸收党史、国史研究的新成果。以当时新闻入条的新华社电讯等不再单独标示。



一九五六年



◀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目 录

1956 年 1 月	1
第 1 周 (1.1)	2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威廉·皮克 80 寿辰)	
第 2 周 (1.2—1.8)	4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队党组参加所在地党的省代表大会的规定》;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送审程序的规定》; 国务院批转《铁道部工作检查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加强财政监察工作向中央的报告)	
第 3 周 (1.9—1.15)	19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请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周恩来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稿;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一九五六年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平衡情况简报》; 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北京市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	
第 4 周 (1.16—1.22)	33
(朱德率代表团在布达佩斯参观; 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关于农业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的报告》; 毛泽东同陈毅、彭真商谈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向党外征求意见问题; 朱德率代表团参观哥特瓦德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博物馆; 中央军委召开第五十七次会议;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听取科学家作关于科学工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经验的报告》)	
第 5 周 (1.23—1.29)	47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动员资本家把账外资金投入合营企业的指示》;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周恩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批复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农村献	